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八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華書局

K207.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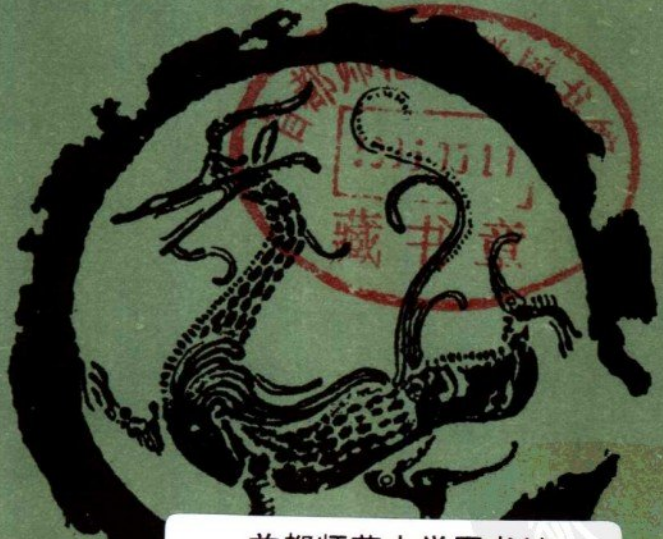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八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355959

贈阅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研究　第八集/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4

ISBN　7-101-04491-3

Ⅰ. 汉…　Ⅱ. 阎…　Ⅲ. 汉学—文集

Ⅳ.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0834 号

书　　名　**汉学研究(第八集)**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印　　刷　北京空研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23.18**　字数:**620** 千字

印　　数　**1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491-3/K.1927**

定　　价　**40** 元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任继愈(*Ren Jiyu*)　　张岱年(*Zhang Dainian*)
季羡林(*Ji Xianlin*)　　汤一介(*Tang Yijie*)
李学勤(*Li Xueqin*)　　曲德林(*Qu Delin*)
安平秋(*An Pingqiu*)　　李向玉(*Li Xiangyu*)

主　编

阎纯德(*Yan Chunde*)

编　委

王　宁(*Wang Ning*)　　乐黛云(*Yue Daiyun*)
李明滨(*Li Mingbin*)　　严绍璗(*Yan Shaodang*)
张西平(*Zhang Xiping*)　　杨翠微(*Yang Cuiwei*)
周发祥(*Zhou Faxiang*)　　侯　健(*Hou Jian*)
耿　昇(*Geng Sheng*)　　柴剑虹(*Chai Jianhong*)
钱林森(*Qian Linsen*)　　韩经太(*Han Jingtai*)
崔维孝(Cui Weixiao)

常务编委

宋柏年(*Song Bonian*)　　阎纯德(*Yan Chunde*)

卷前絮语

今年的《汉学研究》第八集在澳门编竣。这很有意义，因为澳门与汉学有着无法分开的血缘关系。当人们一提到汉学，就会必然想到罗耀拉、圣方济各·沙忽略、罗明坚、利玛窦、罗如望、曾德照、柏应理、金尼阁、卫匡国、汤若望、李明、白晋、马礼逊等无数汉学先驱，他们前赴后继地为汉学的奠基、发展与繁荣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而澳门，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是基地，是驿站。澳门，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是一个充满汉学情结的家园。

在澳门编辑《汉学研究》，感情上很像在西安研究汉唐、在北京研究明清，此乃天作之美。天南海北的作者把研究文稿通过 E－mail 传送到美丽、温馨、纯朴、平和的澳门，或是由北京辗转而寄，这令人感动的一切，都显示了学者们对于汉学研究的诚挚和热切之情。

《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但是，这一集出现了一些新人，这十分可喜。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希望研究者能像春天连天铺地的萋萋芳草，让本来浩瀚如海的“汉学”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研究花园。

今年元旦过后，编者曾经给本书顾问、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给今年的《汉学研究》写一序文。他欣然应允，并说《汉学研究》坚持编辑出版，成绩不可低估，这一块他山之石，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但是，张先生于今年 3 月 23 日竟溘然长逝，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了难以言说的沉痛和损失。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和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在此沉痛地悼念他，愿他在天界异邦安息！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汉学书系编委会

2004 年 5 月 5 日于澳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汉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代序）

汤一介

如果说西方传统“汉学研究”比较多地注意文本研究和名物考订，那么，近十余年来，由于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汉学研究”更多地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而来研究非西方文化，因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关联于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认知”所描述的是从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已有的认识论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不确定的“互动原则”，即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都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正如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①]。他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

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只有从“远景思维的空间”出发，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出发，才会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最近在北大出版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以互动认知为核心，西方理论家与汉学家相结合，形成了一脉崭新的思潮，如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并不懂中文的的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一连写了《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三本书。他们指出：西方哲学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家们和各种哲学运动从各方面向我们熟悉的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客观性的观点提出挑战。这种大趋势迫使我们放弃那些关于确定性的不加分析的假定，实际上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强调不只要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而且要通过双方的对话得出新的结论而有所发展。例如他们认为他们所强调的儒家民主主义就是杜威和孔子对话的产物：杜威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杜威认为，民主的基础是相互沟通的人类社群，人类社群的凝聚力又有助于确立个人的价值。孔子和杜威都强调“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Person - in - concrete - context）”，而不接受完全无约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都是人类社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成就。杜威认为：“民主是表现在态度上的，而不是表现在组织机构上的，而且民主的态度是通过教育逐渐

形成并得到加强的。"他指出: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都可以从孔子的教导中得到引证和深化[②]。

上面提到的这些著作的作者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而是从事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沟通的跨文化研究者。正由于此,这种新的"汉学研究"也许正预示着汉学研究将会为世界文化研究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层面。

附注:

①《跨文化对话》第5期。

②详见《跨文化对话》第10期。

2004年5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汉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代序) …… 汤一介(Ⅰ)

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历程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总序
…… 严绍璗(1)
瑞典汉学:历史的视角 ……【瑞典】罗多弼著　周振鹤译(12)
方济会士利安当与“中国礼仪之争” …… 崔维孝(24)

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法国汉学界的热点 …… 耿　昇(48)
20世纪50年代前的法国汉学研究 …… 许光华(90)
道教传统中的生命、死亡和永生……
【法国】皮埃尔·亨利·德·保仁著　张　群译　钱林森校(116)
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
……【法国】高　第著　马　军译注(139)
德日进的“UNION”与中国的“和合”
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意义 …… 王海燕(148)
科学与形而上学在中国20世纪的关系
——论德日进与梁漱溟的观念 ……【法国】梅谦立(158)
论自由主义作家老舍——二战前老舍小说创作研究
……【法国】保尔·巴迪著　吴永平编译(174)
《四世同堂》:北京的缩微景观
……【法国】保尔·巴迪著 吴永平编译(189)

明清小说在俄国的翻译与研究 …… 李明滨(208)
帝俄汉学的境外延伸——俄国侨民汉学 …… 阎国栋(223)
П. И. 卡法罗夫:生活与科学活动(上)
……【俄国】A. H. 霍赫洛夫著 陈开科译 孔江校(237)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儒学研究 …… 肖玉秋(276)
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艳情文学 …… 李逸津(287)

俄罗斯的汉学与中国的回应 …… 米镇波(298)
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和俄国历史上的汉语教学 …… 柳若梅(302)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中文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 … 张西平(318)
谁是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 …… 金国平 吴志良(353)
清季四川若干重大教案的辨析 …… 秦和平(363)
西人读孔今犹新——西蒙·利斯《论语》注本评介 … 周发祥(395)
英国科技翻译家傅兰雅 …… 熊文华(405)
试论西方中文观念的历史演变
——一个知识型和符号学角度的解说…… 班立华(427)
《老子》研究在西方 …… 陈才智(446)
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马若瑟《汉语札记》…… 李 真(463)
《中华帝国全志》历史部分浅探 …… 王潇潇(481)
卫礼贤笔下的"中国精神" …… 马树德(494)
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王文兵(503)
清代玻璃制造业:位于蚕池口的耶稣会作坊
…… Emily Byrne Curtis 著 余三乐 管永前译(549)
论日本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之一)
——以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为中心 …… 钱婉约(567)
星川清孝的楚辞研究 …… 徐志啸(580)
吉川幸次郎汉学的方法: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 张哲俊(587)
日本人心中的牧溪 …… 周 悦(599)
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评议
——以"巫系文学表"为中心 …… 徐志啸(615)
天人羽衣和七夕传说
——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之一 …… 王晓平(625)
欧文汉学书目
……【日本】石田幹之助撰 甘慧杰译 马军校注(645)
西晋的文学集团 ……【日本】佐藤利行著 周延良译(660)

域外汉籍崔溥《飘海录》简评 …… 葛振家(712)
七百年积累的形象学史料
——兼评韩国林基中主编之《燕行录全集》…… 刘顺利(719)
朝鲜古代汉文诗《箜篌引》与汉文化
…… 李 炬 【日本】李贞爱(728)
李齐贤与他的汉文诗 …… 李 炬 【日本】李贞爱(733)

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历程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总序

严绍璗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Sinology”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

关于“Sinology”的意义,学术界尚有不很相同的理解。所以本文在行文中仍然使用“Sinology”。当使用译文时,译为“中国学”,但同时又要加一个括号(汉学),以示对各学派的尊重。

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一部著作,是《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的一种。它是在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关注国际学术界“Sinology”的学术趋势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回应和点检上一世纪这一学术而展开的专题性研究。

“Sinology”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则是中国的人文学术,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则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于这样的学术的研究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中国文化很不相同。他们是在由他们的文化铸成的“文化语境”中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则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的一种形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

由此考量“Sinology”的学术性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遗憾的是，直至目前，我国学术界仍然有不少人士常常误解了这一门学术。这种误解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仍然有不少的学者，始终把“Sinology”这一学术与中国国内从事的本国文化研究混为一谈，视为一个体系，一种学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北京的两个最有名的大学中，一个大学出版了一种定名为《××汉学》的刊物，登载的几乎全是我国国内学者研究本国文化的论说；另一个大学召开了“国际汉学大会”，会上的发言者绝大部分是中国学者在谈论中国学术。所有这些都让国际中国学家瞠目以对，莫名其妙。

另一个误解是，有些先生以为，只要是个中国人，不需要什么必须的知识装备，只要在外国走一走，参观参观，回来讲讲在座谈会上听来的消息，说说在外国人的研究室中看到的题目和大学里收集来的课程表，就是“Sinology”了。

这样的遗憾当然是因为他们事实上还没有能够介入这一学术的相关的研究层面而造成的。实际上，“Sinology”具有确定性的学术内容。依据我们三十年间摸索这一学术的体验，本学术范畴大致应该具有如下的学术层面：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播，构成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文化的传递可以有多种渠道，其中，有人种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现代有电子传媒。但是一般而论，文献典籍的传播，成为了文化传播最主要的载体。因此作为“Sinology”的基础性的研究，就必须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

的文献，以原典性的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汉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阐述其文化学的意义。失却了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谓对“Sinology”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实，从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来说，一个人文学者，假如他的一生从未做过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么他的所谓的学术，便是大可怀疑的了。

第二，关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 —— 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有人对把这样的文化研究纳入“Sinology”的学术范畴，大惑不解。但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所获得的深切体验，诚如前述，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和他的方法论，都受制于他的母体文化；而他的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会接触的层面，便是造就他们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区域。这样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便支撑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的时候，有些“中国学”家的研究，使中国学者感到不可理解（这里只是就学术范畴讨论，不涉及特定的政治层面和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层面），这是因缘于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形成的“文化的变异”所造成的。因此，研究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的变异，便命定地成为“Sinology”的学术范畴中的内容了。

第三，关于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观”并不一定只有“中国学（汉学）家”才有。只要中国存在和活动着，中国之外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对中国的观念。这些中国观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对各国的“中国学（汉学）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的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独立”，但是，无论是“顺时思维”或者“逆向思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离开他现时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维和对文本的解析，必定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思维的烙印（比较文化中称之为“社会集体无意识”），它们以公开的或隐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多元形态存在。例如，我们现在可以指证二十世纪

的日本“中国学家”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是不受他所生存的时代的“中国观”的影响的，想来欧美亦然。只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特定的对象国的各种“中国观”的形态与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国观”的形态和特征），才能在对特定国家的“中国学”的论述中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宽阔的视野。事实上，从世界文化研究的范畴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中的对象国的“中国观”的研究与阐发，本身就构成了特定国家的“中国学（汉学）”的重要的内容。因此，无论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还是只是进行这一学科中的某一层面或特定课题的研究，为了准确地（即科学地）把握和阐述客体对象，研究者对特定对象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源流的把握，应该是“Sinology”的必不可缺的内容。这几乎成为考量一个“Sinology”的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了。

第四，关于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的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关于这一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是无须再讨论的。但是，指出下列的问题仍然是具有意义的 —— 这就是不要把对象国的次流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主流性观点；更不要把对象国一个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普遍性观点。三十余年来，我们曾经为自己这种在学术上的无知，闹出了好多个“国际笑话”。我以为研究者只要遵守两个基本的学术原则，这种状态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 —— 一是把对任何国家的“中国学”的研究作为“研究”来对待，即所谓的“研究”不是任意的拣拾外国人的“字纸”，研究者必须对特定的对象国的“中国学”进行“学派”和“学派谱系”的研究，起码也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由无知而造成的愚昧。二是研究者必须以忠诚于学术的心态来从事研究，不要试图利用学术来谋求实际的功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对象国的某位学者，其学术水平并不很高，却偏要在我们的杂志报纸上说“××国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甚至弄到对方专门申明自己不是“权威学者”。这种以学术为由头而谋求私利的心态和

行为,实在是一种学术的腐败。

回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内,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孙越生先生筚路蓝缕,主持着一个"中国学研究室",不定期地出版一份《外国研究中国》的刊物,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各人从自己能够看到的国外材料中翻译一些"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最早期的"Sinology"的专门性刊物了。与此相呼应,1977年起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内也编辑一份《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这份出版物小得有些可怜。版面为大16开,每期20页,铅印的封面,打字油印的内文,每期容量约为2万字左右,是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一些学术消息,自编自印,在同行中散发 。这份看起来有点像"非法"的印刷物,却是为后来北京大学的"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奠基 —— 因为后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认定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室",便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1985年又从这里开始,正式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国际中国学(汉学)硕士学位方向"的硕士生(2名)。当时,我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就是让从事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同行,能够大体知道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或许这是一个因缘,孙越生先生因此而与我相识。孙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对"Sinology"极为注目,立意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于是,我们似相见恨晚,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在社科院孙先生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在东单孙先生的家里,共同研讨"Sinology"诸事 。

我本人接触"Sinology",要感谢我的老师——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魏建功教授。1960年9月,当时我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二年级的学生,在我的英文结业之后,魏先生又要我去学习日文。他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 1964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张政烺教授指导)。魏建功教授劝我放弃升学,在北京大学从事"燕京(大学)—哈佛(大学)学社"的资料整理,以期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Sinology"的人才。于是,我便在北大

未名湖北岸“才斋”的顶层上把被封尘了十六年(1949 年起)的“燕京—哈佛学社”的文献掸去尘埃。但是,真是这些尘埃尚未落地,当年 10 月,作为主持这项研究的最高学术领导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先生,忽然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并被驱逐出京城,到山东济南当了副市长。于是,对“燕京—哈佛学社”资料的整理也作为“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活动”而被停止。尽管如此,当时在我还年轻和无知的心中,却留下了“燕京—哈佛学社”的事实和关于“Sinology”的些微的知识。到了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期,尽管时间距我初次涉足“燕京—哈佛学社”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们又都经历了“文革”的沧桑之变,但储存在心头的这个愿望,却总想着待机勃发。

孙越生先生对“Sinology”的执着,令我非常的感动。大约在 1977 年的年底,他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由此而开启后代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20 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Sinology”这一学术准备最起码的材料。当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具有基础性的连续资料的想法,实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维。冯蒸先生为此首先刊出了《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目。1980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刊出了由我编撰的《日本的中国学家》。这是“日本中国学”中一部应用性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当时在世的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日本中国学者 1,105 人,辑录他们的著作 10,345 种,行文 65 万字。这或许是我国学术界关于“Sinology”的最早的一部工具书。尽管这部工具书需要提升的地方确实还不少,但当时却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起了提示析疑的作用。后来,姜筱绿女士等又编撰了《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孙越生先生领衔编著了《美国中国学手册》,从而完成了孙越生先生关于“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第一步。

这里还必须要提到我国学术界在最早确立“国外中国研究”、

"国际中国学"方面也具有首创之功的两个似乎不为人们注意的非公开发卖的刊物 ——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史通讯》和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由中华书局出刊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自 1978 年开始,《中国史通讯》刊登了一些关于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的历史和现况,有综述描写,也有个案报道,皆为外国人士撰写。它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 ,引进了新的视野。但是,人们很难想象的是,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这样的关于"古籍整理动态"的专科性通讯,怎么会在 70 年代末就跻身于"Sinology"报道的首创行列呢?当时大难刚过,许多人对国际学术还双眼未开。记得教育部的官员拿着我申请前往日本的报告,在写字桌上敲了两敲说:"一个学中国文化的人,到外国去做什么!"可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却率先把学术的眼光移向世界,表现了当时作为该《简报》主编的杨牧之先生和他所在的中华书局的学术的前瞻性。从 1979 年《简报》第 4 号起陆续刊登了严绍璗等撰写的关于日本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综合报道,如《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见解》、《日本对〈诗经〉的研究》、《日本对〈尚书〉的研究》等,特别是在 1981 年 3 月,为全文发表严绍璗所做的《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特设一期《增刊》。该文综述了日本史学界近二十年间关于中国史研究中六大问题的论争,即"中国文明起源的提法与关于黄河文明与河江文明的论争"、"甲骨卜辞的整理与关于殷代史的论争"、"秦汉帝国的社会性质和关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论争"、"六朝社会的特点与关于'豪族共同体'的论争"、"唐宋社会与中国社会特点的论争"、"明清研究与'乡绅论'的论争"。此文后来被多次引用和重印,并在日本中国史研究者中有积极的呼应,表现了当时正在觉醒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对域外知识的欲望。这两个刊物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参与,表明了从 70 年代后期起步的这一学术,正在从最基本的学术资料的积累走向关于对"中国学(汉学)"具体的学术成果的阐述和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对"Sinology"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